

## 绪 言

魏晋南北朝，始自汉献帝初平元年，即公元 190 年，终于公元 589 年隋灭陈，历时近 400 年。按照传统史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起始年代，应该定在汉献帝禅位给曹丕的黄初元年，即公元 220 年。而实际上，在此之前，三国鼎立的局面早已形成，而导致东汉帝国崩溃、军阀纷争则肇始于董卓之乱的汉献帝初平元年。本书从这一历史实际出发，故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断代起始年代，定在董卓之乱发生的时间。

魏晋南北朝，同此前的秦汉时期与此后的隋唐时期相比，总体特征差异很大。那两个时期，其间虽然也出现过短暂的混乱与分裂，但是统一毕竟是时代的主流。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固然也有过西晋昙花一现的统一，但是混战与分裂始终处于时代的主导地位。这一历史时期，又可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个历史阶段。魏晋阶段，始于董卓之乱，终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 年）刘裕建宋，共历时 230 年。南北朝阶段，则是由公元 420 年算起，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灭陈为止，几近 170 年。董卓之乱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的曹操经过不断地壮大军事、经济实力，利用挟持汉献帝的政治优势，扫平列强，逐步统一北方。公元 208 年，曹操南下准备兼并天下，但是在赤壁被孙权、刘备的联军打败。赤壁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孙权巩固了在江东的地位，刘备则先据荆州部分地区，并西进夺得益州，三分天下的格局已定。公元 220 年曹丕建魏，不久刘备、孙权两人也称帝建国。三

国中，魏的建国最早，共历 3 代 5 帝，存国 45 年。孙吴存国时间最长，从孙权为吴王（222 年）到孙皓降晋（280 年），前后计 58 年，历 3 代 4 帝。蜀汉只有刘备、刘禅父子两帝，存国 42 年（221—263 年）。西晋建立（266 年）之后十余年才完成统一大业。武帝死后，内乱频仍，并由此触发内迁的胡族首领举兵而起参加混战，最终灭亡西晋。西晋存国 50 年，历 3 代 4 帝。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成为匈奴等胡族军阀争杀的战场，并陆续出现许多割据政权。北方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时间长达 120 年。其间只有氏人的前秦短期建立过统一的国家，绝大部分时间北方都处于分裂混战状态。南方的东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从司马睿称帝的公元 317 年到司马德文亡国的公元 420 年，共存国 103 年，历 4 代 11 帝。东晋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分裂、南北对峙的阶段。在南方，虽然先后有刘宋、南齐、萧梁和陈 4 个政权的更迭，但这中间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 3 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 年）是疆域最大、国力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 4 代 8 帝。南齐（479—502 年）国祚短暂，只有 23 年。由于争杀频繁，竟历 3 代 7 帝，平均 3 年 1 帝，算是中国古代帝王更换速度最快的一朝。梁代（502—557 年）历 3 代 4 帝，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557—589 年）首尾凡 33 年，历 3 代 5 帝。陈承衰梁之弊，是版图狭窄、人口孤弱、力量单薄的王朝，加之统治者又极度腐败，最终丧亡于北方强敌之手。在历史上，把宋、齐、梁、陈这 4 个南方王朝称之为南朝。十六国后期，一个最为落后的少数民族拓跋鲜卑逐渐强盛起来。它先是打败后燕入主中原，在建立北魏政权（386—534 年）之后，又消灭各割据政权，从而结束了这一地区长期混战的局面。按照史家的习惯，北魏统一北方的太延五年（439 年）往往被视为北朝的起始之年。北魏前期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都，孝文帝大举实行汉化，政治中心也随之迁徙到中原腹地洛阳。北魏立国一百多

年，历 9 代 12 帝，是对南北朝历史影响较大的一个王朝。孝武帝末年，权臣高欢、宇文泰将北魏辖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东魏（534—550 年）以邺城为都，历 1 主，16 年。西魏（535—556 年）都长安，经 3 帝，共享国 22 年。东、西魏先后被北齐（550—577 年）和北周（557—581 年）取代。北齐是鲜卑化汉人高氏所建的政权，立国 28 年，有 3 代 6 帝。公元 577 年，周灭齐，北方重新统一。北周是宇文鲜卑人统治的王朝，历 3 代 5 帝，计 24 年。公元 581 年，北周外戚杨坚受代称帝，改国号为隋。历史上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北方五朝称之为北朝。南朝与北朝，合称为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经历一个结构更新和充实的过程。这一变化轨迹，大体可以沿着三条脉络进行寻觅。这就是：（1）主导文化从儒学式微转变为三教并立。（2）胡、汉文化从异质冲突渐进到兼容杂糅。（3）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

两汉时期，神学化的儒学长期处于独尊地位。然而，从汉末起，社会环境的巨变以及自身方面的原因，使得儒学式微。以玄学为先导的多种文化因素蓬勃生长，不但一变百草萧疏而为万木峥嵘，而且也作为道教从原始幼稚走向完备成熟、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经过不断的调整组合，到南北朝后期儒、释、道三家并立的主导文化格局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口的频繁流动与接触，使得异质性十分鲜明的胡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随着长期磨合，入居中原的胡人在被汉文化涵化融合的同时，也为汉人注入胡文化的新鲜活力。在南北交往过程中，文化进步逐渐泯灭了民族隔阂，中华文明在登上新的一层台阶后终于实现了在根基方面的趋同。然而，由于长期分裂隔绝，又使得南北文化的地域特征明显存在。南人善创新，北人重传统；南人崇文，北人尚武；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凡此种种，都是这一时期南北文化趋异性的表现形式。

本卷由曹文柱主编。曹文柱提出大纲初稿，经征求周兆望、施光明意见，形成基本框架。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又视情况对个别章、节、目进行了某些调整。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十三章由曹文柱撰写；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由施光明撰写；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由周兆望撰写；第八章由薛振恺撰写；第十章由旷天伟撰写；第十二章由张敏撰写；武正红为第八章、第十三章提供了部分文稿。周兆望为第十二章的写作进行了指导。全书由曹文柱统稿，对个别章节进行了删增与修改，并编制主要参考书目 确定彩页和随文插图。本卷在写作过程中 参阅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已在页下或书后参考书目中注明，但是仍有部分内容可能因为疏漏没有注出，敬请原谅。

# 第一章 纷乱的社会与活跃的文化

## 第一节 社会变化对文化的震撼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与动荡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结构有所调整的一个时期。前者具体表现为：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频繁发生，使得人口大规模地死亡，即使幸存者也难免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之苦。后者则体现在士族地主势力得到畸形发展和胡族入主中原等方面。社会的剧烈动荡，不但造成文化载体的大量损失，而且打破儒家一尊的局面，刺激多种文化因素的蓬勃生长、重家轻国观念的泛滥和胡汉文化的融合汇流。

### 一、天灾人祸迭加的社会环境与士族地主势力的畸形发展

根据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恰逢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气候寒冷期<sup>①</sup>。当时，年平均气温由西汉高于现

<sup>①</sup>《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

在  $1^{\circ}\text{C}$ — $2^{\circ}\text{C}$ ，降至比现在低  $1^{\circ}\text{C}$ — $2^{\circ}\text{C}$ 。按现代农业技术，气温年均下降  $4^{\circ}\text{C}$ ，对于农作物种植、管理尚有很多不易解决的困难。古代社会，无霜期大大缩短，自然使谷物产量减少，部分耕种、灌溉条件较差的田地被抛荒。气候寒冷，又使北方和西北方的草场枯竭，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因无法从事畜牧业，转而进入汉族传统的农业区，造成民族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激烈的冲突。祸不单行，与寒冷期降临同步的是太阳黑子（日斑）活跃性的到来<sup>①</sup>。日斑有否决定着太阳辐射的强弱，而太阳辐射的增强又造成地球上气候的波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日斑，比气候温暖期高约 3 倍多。其结果，不但导致气候转寒，而且对其他自然灾害的生成也有一定的影响。从东汉后期起，自然灾害连绵不绝，而且大灾频仍。到了“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间中遇灾凡 304 次 其频度甚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疫疾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sup>②</sup>。这种灾情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后期。灾荒饥谨，再加上人为的兵燹战祸，到处白骨委积，尸骸如山。当时社会的卫生条件极差，大量人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很容易使疾疫爆发。由于人口流动频繁，疫区迅速扩大，使死者数目骤增。曹操晚年，在他割据的北方爆发过一次严重的疾疫，这就是著名的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大疫。大疫使“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sup>③</sup>。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王粲先逝外，余下 4 人皆死于此疫。上层社会的成员尚且如此，一般百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与天灾相较，人祸更是造成社会苦难的主要根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的黑暗与阶级压迫是非常严重的。官

① 程庭芳：《中国古代太阳黑子记录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56 年第 4 期。

②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版，第 12 页。

③ 《续汉志·五行志》注引曹植文。

场的腐败，始于汉末。大小权贵把持着各级权力机构，就连品评士人的乡曲舆论和社会公论，也被他们控制起来。于是，许多士子“不复以学问为本”，纷纷攀权附势希图提携，浮华交会为谋称誉，弄虚作假以求通显。皇帝公开标价卖官，又使本以体现名教之治的察举标准，堕落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这种情况，虽屡易朝而不改，反而愈演愈烈。魏晋时，许多现象经过扭曲交形被固定成为制度。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九品官人法的实行。政府屈从大族意志，在州郡设立大小“中正”，负责品评士人，吏部授官，根据的就是中正所定的品级。此法弊端过于前代。汉世“乡举里选者，采毁誉于众多之论，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于一人之口”<sup>①</sup>。由于中正皆由“著姓士族”充任，所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sup>②</sup>的现象日益严重。至于作假之风，同样延袭不变。吕思勉先生归纳两晋士习特点说：“《晋书》所载居丧过礼、庐墓积年、负土成坟、让财让产、抚养亲族、收恤故旧之士甚多，岂皆笃行？盖以要名也。”<sup>③</sup>卖官仍然在进行着，而且行径更加恶劣。西晋时，刘毅指责武帝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sup>④</sup>。王沈作《释时论》讲，当时“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sup>⑤</sup>，朝廷成为乱哄哄的闹市。政治的黑暗，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汉末时期，百姓已“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sup>⑥</sup>。黄巾起义就是在百姓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的。进入魏晋南北朝，统治者不断加剧对民众的盘剥。两汉的口赋、算赋等人头税被合并为户调制。为扩大税源，政府对百姓的财产进行评估，以此划分户等，“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一》。

② 《晋书·刘毅传》。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00 页。

⑤ 《晋书·文苑传》。

⑥ 崔寔：《政论》。

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贵实”。租调之外，还有各种杂税、杂调，有的时期还预征数年的租调。两晋把服役年龄改为 13 岁为半役，16 岁为全役。使用尚未发育健全的孩子承担劳役，连上层人物也有“伤天理”之叹。南朝还有役使女丁的记载。那一历史时期，朝臣都愿意为地方官，并毫不讳言是“求富”。有的官吏扬言求富的手段是作到“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sup>②</sup>。结果，平年岁月“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sup>③</sup>；一遇灾荒，马上出现“人多饥乏，更加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sup>④</sup>的惨景。由于长期分裂割据，魏晋南北朝时期未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但中小规模的起义一直不断。比较著名的如西晋末年的张昌、李特等人领导的流民起义；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和南朝的唐、寓之起义；十六国时期的梁犊起义和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等等。

魏晋南北朝，从总体上来说，虽然也出现过西晋时期的短暂统一，但是分裂割据始终处于时代的主导地位。各割据政权为维持和扩大统治区域，以及达到抢掠人口的目的，经常发动战争。此间四百年，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达百余次，其中大规模的战争不下二三十次。战斗各方投入的兵力少则数万、十几万，一般都在数十万左右，多者几近百万。后者中较为著名的有赤壁之战、西晋平吴之战、淝水之战、宋魏之战等等。这类战争不仅造成大量军人伤亡，而且也殃及众多平民。曹操攻陶谦不克，过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sup>⑤</sup>。宋魏之战后，魏军在撤退途中大肆杀戮，不但斩杀青壮年，而且连婴儿也不放过，“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

① 《宋书·周朗传》。

② 《梁书·鱼弘传》。

③ 《南史·邓元起传》。

④ 《晋书·食货志》。

⑤ 《后汉书·陶谦传》。

万，自免于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sup>①</sup>。即使统一或相对安定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权力而酿成的动乱也从未停止过。这种动乱，很多时候也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使大批无辜死于非命。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梁末的“侯景之乱”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八王之乱”中，仅三王联兵攻打司马伦一次战争，就杀人十几万。其后司马越部属祁弘大掠长安，杀死平民 2 万余人。侯景乱前，建康城中有居民 28 万户，乱后生存者只剩二三千人。侯景之乱，使富庶的江南变成“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sup>②</sup>的人间地狱。与统治集团内乱交错发生的还有民族间的仇杀。西晋末年，匈奴、胡羯贵族连破洛阳、长安两京，俘杀怀、愍二帝，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民族大屠杀。这不但给广大汉族人民带来极大苦难，而且兵锋所及，“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杀士女，鲜有遗类”<sup>③</sup>，使汉族上层人物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同样，汉族统治者也煽动复仇情绪，滥杀无辜。冉闵灭石赵后，下令诛杀在邺城的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类似的仇杀在石赵境内其他地区也进行着，“于是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sup>④</sup>。

频繁的天灾人祸，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造成人口的巨大损失。魏晋南北朝，在中国人口史上是一个低谷期。唐人杜佑综合零散的史料，估约西晋在籍人口为 767 万左右<sup>⑤</sup>，只有汉世的 1/7。当然，实际人口损失没有这么多，还有很多脱籍和被私家荫占的人口未被统计在列，但最乐观的估计人口丧亡也要过半。以后人口数目有所回升，到隋统一时达到 3500 万，然而

① 《宋书·索虏传》。

② 《南史·侯景传》。

③ 《晋书·石勒载记》。

④ 《晋书·石季龙载记》。

⑤ 《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

只略多于汉世盛年人口的半数而已。

从东汉后期起，士族地主迅速发展起来，到魏晋达到极盛。南北朝时期，它虽然逐渐转衰，但是依然有很强的势力。

士族在名义上仍归属在编户齐民中，但是实际上它不仅傲视社会各阶层，甚至一度凌驾于皇权之上，成为一个享受特殊政治、经济等权力的等级。士族占有世代传袭的庞大私有土地和数目惊人的依附人口。西晋颁布占田荫客制，从法律上肯定士族的经济特权，更刺激了士族势力的膨胀。如东晋侨姓大族谢氏，在江南置办的田产有十几处，劳动人手上千人；土著大族孔灵符一家仅永兴的一处田产，周围就有 30 里，水旱田 265 顷，并含带二山和果园九处。士族荫占的劳动人口不归政府管辖，只登记在主人的家籍里，也不对政府承担赋税徭役。在政治上，门品决定官品，名门贵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sup>①</sup>。朝廷中的高官显宦则几乎被士族所世代盘踞。在法律上，士庶不平等，各种惩治性的连坐条律一般都不对士人生效，“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sup>②</sup>。总之，士族垄断了中央和地方的清要之职，享受着减免赋役、荫庇亲属、招徕门生故吏私附和赐田、给客、赦罪、恩赏等等特权。由于这些特权是世袭的，因而士族已发育成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特殊社会阶层。

士族的称谓很多，除士族或世族外，还有甲族、望族、名族、华族、冠族、高门、右姓等名目。士族内部又有高门华族和次门寒士之别。即使同为高级士族，各姓之间地位也不平等。东晋时随司马睿渡江的士族有一百多家，然而这些列入《百家谱》的侨姓高级士族中，唯王、谢、袁、萧四姓为大。南方土著的吴姓高门中，唯朱、张、顾、陆为大。而侨姓地位又远在吴姓之上。北方情况类似，魏孝文帝定士族，汉族士族号为郡姓，少数

<sup>①</sup> 《南齐书·王俭传》。

<sup>②</sup> 《南齐书·竟陵王子陵传》。

民族出身的土族为虏姓。郡姓又“差等阀阅”，有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别；虏姓中的“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也有高下之别。一姓之内，由于世系的近疏、地位的升迁同样第其房望，彼此地位悬殊。所以土族又是个以家族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等级森严的排它性极强的社会集团。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口频繁流动与冲突，是造成东晋南北朝和十六国北朝长期分裂割据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汉以来，北方、西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在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同汉族人口犬牙交错地生活在一起。魏晋时期流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种类越来越多，人数越来越庞大。其中，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最为突出，史称“五胡”。东汉之初，匈奴分裂，南匈奴开始归附汉朝，并在汉末由塞外移居塞内。曹操统一北方后与南匈奴为五部，将之徙往今山西境内的晋中晋南一带，人口大约有 20 多万人。羯人入塞比匈奴人略迟，时间在魏晋之际，内迁后主要居住在上党一带。氐、羌原居青海、甘肃一带。汉魏之际，汉族统治者为屏蔽中原，大量迁徙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充实关中。曹操命张既一次徙武都氐就达五万余落。西晋时期，氐、羌人民已占关中人口的一半。鲜卑是原居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分东、中、西三部。东部为宇文部、段部，中部为慕容部，西部为拓跋部。东部鲜卑后来被慕容部兼并。鲜卑人在西晋时期势力已达到辽西至代北一带。西晋末年，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乘汉族统治者内乱之机，也加入混战的行列，先后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冉闵之乱，仅距西晋灭国 30 年，原汉人居住的腹心地区司冀一带已有“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sup>①</sup>。北魏初期，并州胡人、常山赵郡丁零人、关中氐、羌人，都是当地人口的重要构成。隋统一时，华北平原、关中平原的民族成分十

《晋书·石季龙载记》。

分复杂,长安虽是王都,却“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sup>①</sup>。

西晋末年,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为逃避各族统治者的杀戮,纷纷外迁。虽然流出口大致有东北、西北和南方三个走向,但是前两处远没有南方接纳人口多。从西晋末年到刘宋中叶,南方共接纳北方汉族人口约 90 多万,占司、豫、冀、青、徐、并、兖、雍等北方八州 900 万人口的 1/10。

## 二、社会变化对文化的震撼

无论是天灾人祸迭加所造成的混乱与动荡,还是士族地主势力畸型发展和胡族入主中原所引起的社会结构调整,都对社会变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给予文化的震撼最为剧烈。

首先是文化载体的巨大损失。战争、动乱不但大量地破坏物质财富,也使千百年凝聚起来的精神文明成果毁于一旦。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名都大邑反复遭到摧残,特别是一些处于文化中心的都城地区被毁尤甚,如长安、洛阳和建康等城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东汉时都城洛阳国家藏书数目很大,“《石室》、《兰台》弥以充积”,然而“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曹魏、西晋两朝惨淡经营,采掇遗亡,汇集新作,国家藏书又达 29945 卷。晋末大难,“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南朝时期,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国家藏书规模空前,仅梁末元帝迁都,由建康带到江陵的图书就有七万余卷。但“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宝贵的文明成果再遇浩劫。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图籍长期严重残缺。待魏孝文帝提倡文治,“借书于(南)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以后又遇变乱,元气大伤,周灭北齐时,两国藏书加在一起不过 15000 卷。作为

《隋书·地理志》。

文化创作和传播的更重要载体知识分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命运也特别乖舛。许多士人被战火、饥馑、疾疫夺去生命，还有的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牺牲品，或惨死在异族统治者的屠刀之下。侥幸保存性命者，也饱尝流徙逃亡和铁蹄践踏之苦。

同时，原有的主导文化逐渐失去权威。一种相对稳定的主导文化，总要与同样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两汉时期神学化的儒学所以长期处于独尊地位，也是和它适应汉帝国大一统专制集权制度的需要分不开的。汉武帝时，董仲舒借用阴阳家的理论，对儒学进行神秘主义改造，创立了一整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政治论。以后又在统治者的主持下不断完善，实行谶纬化，使本来作为文化一脉的儒学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了类似宗教的约束力。但是随着分裂割据取代了大一统，汉代儒学一尊地位的政治基础出现危机，传统的价值观逐渐变异。于是，一部分士人开始对于名教之治基石的“三纲”产生了较深的疑惑。否定君臣之义、父子之伦以及夫妻之间不拘礼法的言论和行为，颇行于世。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位的衰落，就在于它过分依赖两汉社会的政治权力。这种受权力支配的学术处处委身于政治规律，自然也承受不起任何巨大的社会变动。汉代儒学在被统治者推向极致后，逐渐出现两种弊端：一方面因过分的章句推衍而导致繁琐穿凿；另一方面则因灾异学说和图谶纬书的缠绕堕落成粗糙庸俗的神学。繁琐穿凿使人不得要领，易生厌烦；神学粗糙必然破绽百出，欺骗性很差。于是，从东汉后期起一批学者改弦更张，或对儒学本身进行清理，或援入道家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再造。著名学者郑玄兼综诸家，遍注群经，对混乱的汉代经学做了一番总结性的清理，为后世解经奠定了正例。正因为此，正统儒学能够顶着强劲的玄风，在东晋南朝相继不绝；十六国北朝，儒学虽然未取得独尊地位，但受到社会上下的重视，更是不争的事实。学者振兴儒学另一举措是清除谶纬。从汉末起，有识之士不断地对谶纬神学展开无情的批判。魏晋南北朝，谶纬不但从儒学中被大

部分剥离出来，而且受到官方明令禁绝。汉末最早向玄学潜行的人物是马融。这位经学大师，公开颂扬“生贵于天下”的老庄理论。汉魏之际，“荆州学派”已公开阐扬玄理<sup>①</sup>。进入魏晋，玄言大倡，流派纷呈，先是在京洛，后在南方取代儒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玄学家中，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人物之间的学术见解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都或轻或重地用老庄之学否定了汉儒的天命观，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汉儒所倡导的名教之治，有意无意地抬高了老子的地位，甚至将之与孔子比肩。玄学在理论思维上的高度是汉代儒学无法企及的。汉儒在哲学上基本停留在具体的现象世界，抽象思维水平很低，而玄学则精致得多、深刻得多。玄学探讨的是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事物形态之外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从而提出了本（本质）末（现象）两者关系的本体论哲学问题。玄学涉及到从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到人性论以及政治论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把我国古代哲学理论思维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它的出现有如一股春风，吹进了汉儒统治下的思想文化界，一扫沉闷为清新，士人莫不趋之若鹜。

当时也是多种文化因素蓬勃生长的时期。汉魏之际，随着社会的大混乱，思想界在摆脱汉儒桎梏后也出现大混乱局面。除上述新兴的玄学和对“三纲”的叛逆之说外，其他学派也纷纷粉墨登场。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曹操、诸葛亮等政治家打破汉家纯任儒术的僵局，极力崇尚名法之学。整个魏晋南北朝，正统儒学虽保有一定的地盘，但是很多旧学也不甘寂寞，法、道、名、杂、墨、兵、纵横诸家都适应新形势，顽强地表现着自己<sup>②</sup>。至于异端学说、奇谈怪论更是不断地破土而出。神仙鬼怪、道佛巫筮充

① 参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和王葆玟：《正始玄学》（齐鲁书社 1987 年版）。

②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67 页。

斥世界，甚至连唯物主义也挤了进来，占有一席之地。在乱哄哄、争吵吵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汉世未有的生机勃勃的多样性文化丛生的场景。

另外，在士族群体内部，还滋生出一种家族至上的观念。由于士族是以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等级森严的排它性极强的社会集团，他们所享受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特权是世袭的，所以到士族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东晋时期，在这些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特权地位胶漆坚固的依靠，并非来自封建国家，而是自己的宗族姻亲。正如清人赵翼所云：“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其视高资隳仕本属分所应得，非关国家之简付。”<sup>②</sup> 宗族利益至上成为士人信奉的人生哲学，对内他们互相援引提携，对外不允许任何竞争者存在。只有个别人的行动与家族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才同室操戈。

“君统的变易，朝廷的更迭，反而一似与己无关。在禅代废立之际，世家大族不是不预闻，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转移”<sup>③</sup>。有的史家把东晋南朝士族这种重家轻国的心态概括为：

“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sup>④</sup>。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重家轻国观念能在上层社会这样普遍流行，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显然，它与士族地主势力的畸型发展和儒学的式微是分不开的。

最后是胡汉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原生活在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大部分从事草原游牧经济或牧畜业。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上的人口，其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都同在中原地区从事农耕经济的汉族人口，有着很大的不同。两种文化，由于有着鲜明的异质性和不兼容性，在加之双方在交流过程

《陔余丛考》卷 17。

②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04 页。

③ 《南齐书·褚渊传论》。

中，长期处于不平等和不和谐的状态，甚至表现为对生存空间你死我活的争夺，所以最初两种异质文化在接触后，冲突不可避免。但随着长期的磨合，入居中原的胡人在被汉文化涵化融合的同时，也为汉人注入了胡文化的新鲜活力。

## 第二节 汉、胡统治者对文化的选择与调整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少数民族的内迁，在北部中国曾先后出现过众多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们与在南方的汉族王朝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维持和巩固政权，胡汉统治者都能及时地对文化政策进行调整。

### 一、汉族统治者对主导文化的选择与整齐风俗

魏晋南北朝是多样性文化丛生的时代。面对这一形势，历代汉族王朝从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在对主导文化进行艰难选择的同时，还适时地对异端文化加以剪除和改造。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政策呈现波动性很大的特点。

汉魏之际，群雄扰攘，为扩充实力、争夺天下，往往不择手段。曹操把“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作为用人标准，是公开蔑视旧的道德规范。魏、蜀两国最初都采取了以法治国的方针，法家特征十分鲜明。只不过诸葛亮主张刑礼并举，既强调法治，也不偏废伦理纲常；而曹操则明示“拨乱之政，以刑为先”<sup>②</sup>。将刑名法术思想放在首要地位，目的在于强国足兵，争雄天下。但是当北方初定，曹操也转而注意到儒学的教化功能。建安八年

《曹操集·举贤勿拘品行令》。

② 《曹操集·以高柔为理曹掾令》。

(203 年)，他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sup>①</sup>。以后他那些当了皇帝的子孙，都在崇尚法术之余，给予儒学一定的地位。

曹魏政权的文化政策，始终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转移。曹操在汉末曾是党人的同情者，但到掌握权力后，很快就对“阿党比周”的文人结社活动反感起来。建安十年（205 年），他以“整齐风俗”为名，下达破散朋党的法令。曹操、曹丕父子还用“浮华交会”罪名，屡兴大狱，杀掉不少善思索、敢议论的知识分子。太和末年，明帝曹芳再起“浮华”案。但是由于参与者过多，这些人的父辈又是朝中的重臣，故曹叡未像父祖那样大行杀戮，只是以免官禁锢，匆匆收场。至于道教，曹魏统治者在镇压之外，对其上层人物或诱以利禄，或软禁在京城之内，力图限制它在民间的发展。

由曹魏末年开掌权的司马氏，虽然因背信欺诈、凶残狠毒而获讥于世，却打出“以孝治天下”的旗号。他们一面以“傲世败俗”立罪，杀害反对自己的某些玄学名士；一面做些“经始明堂，营建辟雍”的所谓振兴儒学的表面文章。到晋武帝的晚年和惠帝在位期间，西晋高层政治权力逐步落入正始、竹林时期的玄学青年之手。在首都京洛地区，玄学成为统治思想界的主流文化。这一时期，玄学流派纷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王衍的新贵无派、裴頠的崇有派和郭象的自生独化派。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都使玄学理论发展到一个高峰阶段。西晋在文化建设上也是有成绩的。荀勖受诏整理国家藏书，作《中经新簿》，开我国图书四部分类的先河，也是史籍独占一部的发端。集中专家，对于“汲冢古书”进行系统校缀考订，当属中国古代罕见的一次官方主持的考古文献整理工作。

东晋时期，真正控制国家权力的门阀士族鉴于国破家亡的教

<sup>①</sup>《三国志·魏书·武帝纪》。